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六一 ——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八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11b)

---

【历史诘问】毛周“交易”及其政治后果	陈小雅
【史实辨析】吴法宪为什么闹翻案	菜 九
【学术批评】重要史料缺出处和情绪偏见影响权威性 ——点评《晚年周恩来》	洪 辉
【亡灵祭坛】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名录	曹思源
【以史为鉴】谁识老毛真面目？——读《王申酉文集》	余 杰
【读史随笔】读《遇罗克》断想	郑也夫
【各抒己见】毛泽东与文化革命——中国精英集团和平民集团的冲突	危 言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历史诘问】

### 毛周“交易”及其政治后果

• 陈小雅 •

依照政治权力被限制的程度，人们习惯分出两种政体：凡政治权力按照最高统治者意愿进行分配的，称为“专制政治”；若按照“民意”进行分配的，称为“民主政治”。然而，上述两种“纯粹的形态”常常只存在于发展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社会，在一些动荡频仍、政变迭起的国家与社会，那里的政体不论简单地划入哪一类，都给人“足不适履”的感觉，以此套用中共党内斗争、臧否人物，也不得要领。

是否存在政治权力像股市一样，按照“入伙分红”的原则，根据加入者的“资本”进行分配的一种“股份政治”呢？一百多年前，John Stuart Mill (1808—1873) 和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 就提出“国家是一种股份公司”的思想，不过，根据英国政治历史发展的特点，它可能更倾向于其“经济对政治的决定

权力”，而在“东方”和其它更广大地区，这“资本”的含义更广泛罢了，它的具体内容，依特定社会的生长特点和成熟阶段而各不相同。在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描述的日耳曼部落里，男人的“价值”在于他身上的箭疮和刀伤，那时，躺在充满野性的日耳曼姑娘怀里，被数着伤痕的战士，就是今日“傍小秘”、“娶二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大款”。

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文革回忆录中，常常记叙人们当时的心态：大家在表面上都说“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但真正面对打倒老干部的事实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会自问：难道他们不是对革命有“重要贡献”和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吗？张志新就是为这种信念付出了生命。可见，这个人们心目中的“重要贡献”和“汗马功劳”，是有“价值”的、有“权威”的，是不依“最高统帅”的命令而转移的。而一旦这些“价值准则”发生动摇，“原则的革命”就开始了。所以，林彪说“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革过去革过的命的命”——这并非一种胡说。

又如，1989年“六四”后在海外形成的“民运”，也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准则进行权力分配的。这种“资本”，就是人们从事民运的“资历”。如此，才有围绕着天安门英雄、民主墙斗士、六四黑手、民运之父、之兄、之嫂和XX喇嘛的“人力资源”配备、“经济资源”聚集，进而至于媒体关注的“等级分布”……。这种政治具有两种前途：向前进入民主政治，向后堕入专制政治。

同样，当专制者威信急速流失，专制统治无法维持、走向解体时，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再次流转，并重新分配，这也预示着一种“革命”的到来。目前的中国和70年代的中国，大致均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笔者发现，当我们使用“股份政治”的概念看中国现代历史时，不仅所谓“高岗事件”、“林彪事件”、“四人帮”的评价问题迎刃而解，就是那看来扑朔迷离、讳莫如深的“毛周关系”，也不是“不可言传”的了。

#### ◇ “股份政治”

历史的起点，往往就是逻辑的起点。

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权力，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进行分配的。社会的资源和利益，也是依照与这些斗争和这个集团的密切程度，像波纹一样，按等级分布的。由于这个“引力场”的客观存在，为要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像股市中的“小股民”追逐“强势股”一样地附骥于政治上的“强势集团”，努力地越过自己所在的圈层，向中心靠拢。在这里，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自然而然地表现为自我“背叛”的权利，在“必要”的时候，践踏他人权利的“权利”。又由于这是一种社会公认的“价值”，人们对那些在民主社会看来等同于“犯罪”的行为必然见怪不怪！

——这种“向心运动”的结果，就是核心权力的日益强化，而外围最终全部丧失自我。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十年，专制政治自我“炒作”动能耗尽，直至自我否定。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最高统治者威信急剧流失，毛泽东既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路数统治下去，高层政治生活也无法照旧继续下去，于是中国的政治出现了转机。

然而，这次政治转机，并未成为民主政治的起点。

随着“解放老干部”的开始，社会政治与经济资源开始背离“文革权贵”的意愿，按照旧

有的“价值观”重新聚合。毛泽东的“大树”虽然未倒，但“东风”与“西风”的争夺，已然势均力敌……

而这种“股份政治”的回潮，确是由一笔“巨额”政治交易的成立为背景的。

#### ◇ 周恩来帮毛泽东“圆谎”

在《再谈毛泽东与“水浒”》一文中，我们已经谈到，为要挽回“林彪事件”的影响，掩盖毛泽东亲自发动、并寄予最高理想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不得不与江青“串谋”，制造了一份“三年早知道”的文件——即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由于这封信的披露，人们才得以把林彪的“出走”——这一“文革”的最大失败，无耻地宣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但是，这出戏得以成功上演，除了需要有江青的配合外，还要有另一位“帮衬”。而在中共党内高层，有资格、有能力、有愿望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被称为“红朝宰相”的周恩来。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帮助毛泽东“圆谎”的呢？对于这一幕，王年一在其《大动乱的年代》中，留下了难得的记述：

（1972年5月，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最主要的文件是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关于这一文件，周恩来5月21日说明如下：“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份同志看过。”“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了冷水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武汉的。……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非常深刻的一封信。”（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443页。）

——在这里，周恩来主动承担起八年前“在场”的角色，这无疑对毛泽东导演的这场戏，起到了“鼎力”证明的作用。也许事实正如周恩来所说，他的确在事发当时看到过那封信的副本，并且有其他“政治局委员”（据说是王任重）也读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相信周恩来，而一定要说周恩来是帮助毛泽东“作弊”呢？除了笔者在《再谈毛泽东与“水浒”》一文中，对毛信本文内容所作的辨析外，我们还有其它证据吗？

仅仅根据王年一的以上记叙，就可以提出四条质疑：

其一，关于这封信的面世，毛泽东为什么没有留下一句话？

其二，“政治局一部份同志看过”这封信是有可能的。但他未指明在何时、何地，也未指明是原件，还是其它版本。

其三，周恩来自称读到过毛泽东信的抄件。这也有可能。但他没有说，他当时看到的那封信与发表的信是否内容相同。

其四，接触过这些会议讲话的王年一，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掌握者，亦不相信“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判断，在整个事件的估价中，享有高于局外其他人判断的地位。因为，在下面，他继续写道：

“到会同志学习了这一封信，政治局九人分到各组解释这一封信。江青的解释刊登在会议简报上，她说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没有根据，不合事实。……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公布这一信件，可能是想说明毛泽东对林彪早有认识。其实他回答不了过去何以重用林彪这一严肃而尖锐的问题。”（同上，1988年12月版443页）

那么，“政治局一部份同志看过”的这封信，到底是那种版本呢？根据当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徐景贤回忆，是林彪事件（即1971年9月13日）以后，毛泽东从他的档案中找出的原件的“抄件”——和周恩来自称在1966年7月11日在武汉看到的版本一样，至于那封信的原件到哪里去了？徐景贤说，早就被周恩来烧掉了！

请看徐景贤在《一封原件已烧毁的毛泽东信件》一文中，是如何写的：

“这封信公开发表的过程。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告诉我们，一九六六年七月江青收到毛泽东这封信后，感到十分重要，给周恩来看了，江周商量，觉得应把这封信给林彪看，于是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但指示给林彪看后当面烧掉。当时林彪在大连，周恩来特地把信送往大连，给林彪看后当面烧毁。但等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命丧大漠后，毛泽东却从他的档案里找出了这封信的抄件，并决定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原来，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写完了这封信后，当即要随身秘书照抄一份，原件发出，抄件存档。为了使与会者相信信的真实性，周恩来特地把抄件复印后发给与会者过目，并带回去各自存档。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的人字迹很稚拙，抄在直条纸上，上面留有一两处改动，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周恩来并把抄件印成铅印本，发给与会者人手一份，形成了中央文件。”（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月10月号）（见本刊zk0310a——编者）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周恩来的叙述，已经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在“王本”中，周是在武汉毛泽东那里看到这个抄件的；而在“徐本”中，周是在江青那里看到的（当时江在上海）。不仅如此，周看到的是毛泽东给江青信的原件。他不仅看到过这封信，并且握有这封信的“处置权”！

——这就给周恩来在这个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份量”。

那么，周恩来是否当着林彪的面，销毁了原件呢？林彪已死，没有第二个人知晓。

但无论如何，周恩来事后还是选择了帮毛泽东“过关”的立场。不仅他个人如此，连素来“低调”的邓颖超也加入了这一“交易”的行列。徐景贤写道：

“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后，每个人都要表态，发言都要上简报。我也在小组讨论时作了发言：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两面派，‘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林彪的问题早有察觉，等等。其他人的发言，也都是这个基调。另外，也有人称颂江青的，例如邓颖超的发言，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读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同上）

◇ 毛泽东为何沉默？

在这场“政治秀”中，毛泽东的“现场”态度，当然是人们评分的最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虽然上场，但没有留下一句“台词”。

而事情的蹊跷也许正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留下毛泽东的话，并不等于他没有说话。他如果没有说话，是会不会有人“斗胆”去发表他的私人信件。而根据以往的惯例，毛泽东字字如金，即使“放屁”一类的措辞，也会记录在案；每临会议，“最高指示”的传达也总是要记叙在先，传达在先，重点强调和专门学习的。但是，在如此重大的一件事上，却没有。这说明，毛泽东的话，是被刻意“隐”去了。那么，谁能作出这样的决定，隐去毛泽东的讲话呢？谁敢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只有毛泽东自己。如果这封信真如公开的信息所说，没有什么“来历”的问题的话，毛泽东应该不回避为它作一些说明。并且在说明时，也可以是理直气壮的。但是毛泽东却没有。

——这是否说明，毛泽东是在刻意回避一个今后将发生的“历史的诘问”呢？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记载了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一段耐人寻味的谈话：

“毛在林彪事件后不久会见越南总统范文同时，在谈话中言不由衷地承认他在林彪的问题上犯了错误，然后又指著陪见的周恩来等人，语带调侃地表示：‘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周氏见状，赶紧表示：‘我们也犯了错误。’”（毛泽东、周恩来会见越南总统范文同时的讲话，1971年11月22日，载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361—362页）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所示，毛泽东不仅早就看穿了林彪，而且洞穿了历史，他何错之有？他又有什么需要周恩来们“原谅”的呢？这段讲话，对于他们精心制造出来的说辞，难道不是一个有力的“反证”吗？

所以，笔者认为，这与其说是毛泽东“言不由衷”的“调侃”，不如说这是毛泽东“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

是毛泽东自己，几乎泄露了“天机”！

◇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回赠”

以上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毛泽东的心态，是一种“犯错误”的心态，同时也说明了有关“政治局委员”和周恩来选择了“原谅”毛泽东的态度。而人们如何才能“原谅”毛泽东，而又能被这个自尊的“帝王”接受呢？一个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接受毛泽东为自己编造的说辞。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此时的毛泽东，作为“帝王”的威权，已经风光不再了。正因为如此，在这场“政治现代秀”中，他不能单方面地接受臣僚们对他的“馈赠（原谅）”，他也必须按照“股份政治”——礼尚往来的原则，给“赠与者”——即入股者以“回报”了。这一转变，在数年之后——“主人公”的弥留之际，已被毛泽东确认为“既定方针”。尽管绝大多数人对“它”的内容不甚了了，甚至怀疑它是否存在，但是，其实在“林彪事件”之后不久，人们已经在这个“新规则”中生活了。

不过，这种“新规则”的“不规则性”的的确确是由毛泽东态度的暧昧和历史的诡秘造成的。

这里，我们就要说到，在那次“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毛泽东给予周恩来的“回赠”。

王年一继续写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6月10日、11日、12日在会上作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在讲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周恩来光明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感人至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6月23日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中共中央又发了文件加以说明，并附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党内高级干部。毛泽东当时说过，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件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大动乱的年代》，444页）

——据称，在会议的原计划中，并没有这些安排。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些古怪的提议呢？《晚年周恩来》的作者认为，毛泽东这样作，并不是在“挽救”周恩来，而是在“整”周恩来。为什么要“整”周恩来呢？是因为他在病重时，曾许诺过要“交权”给周恩来，此时，他后悔了！他要把承诺收回来。（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373页）然而事实是，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并不是“收回”权力，而是更进一步地交出了权力。在党的“十大”问题上如此，在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上也如此，在内政外交问题上也是如此。况且，周恩来的历史问题“早有定论”，仅毛泽东自己，历史上就有三次为周恩来“作证”，甚至留下了文字记录；几十年来，周恩来的“总理”地位从未因那些问题而动摇过。

那么，如何解释此后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过对周恩来的批评呢？笔者认为，这并不说明毛周之间没有“交易”，而是因为这场“交易”存在极为复杂的内幕。何况，参与这个“交易”的还有“第三方”，即江青代表的“文革上台派”。在毛泽东一方，他也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对于任何专制统治者来说，“交易”是被迫的。“交易”总是在力有不逮、势所不及的情况下才缔结的。正因为毛泽东是被迫的，他对“握有把柄”的人才更加防范，并对可能存在的“要挟”更加憎恨。这，也是历史的规律，人之常情。

#### ◇ 毛、周、江——新“三国演义”

在世界历史上，凡帝王与臣属缔结和约时，帝王就不再是帝王，专制政治也就无法再维持下去。

由于“四人帮”对文革的“贡献”，他们在客观上已成潜在的“强势集团”，再加上江青对毛泽东这个“游戏”的入股，她在客观上手里就多了一张向毛泽东“讨价还价”的“王牌”，并因此而是成了毛泽东的“债主”。她不甘心“参与游戏”的周恩来独得“文革”后组阁的权力，更不甘于“文革”的最终果实，又回到“走资派”手里。所以，她必然要“闹事”。

在新形成的“江周对峙”中，“四人帮”已经掌管着“舆论王国”的大权，并伺机插手军队；周恩来一直掌管着“经济王国”的大权，在军内有着深厚的根基。毛泽东此时虽然仍象征着“汉家道统”，具有“仲裁”的地位，但除了“军事王国”以外，已无真正的“地盘”。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他都必须“联合”一方去制服另一方。而在江周双方的战斗中，“反毛”这种指责，已仅仅是一根打击敌人的“棍子”，它丝毫也不意味着自己是忠诚的。在这场“新三国演义”中，三方“交火”的地段，一在人事、二在外交、三在教育。每一次“摩擦”都是以毛泽东的“合纵”或“连横”了结，而又不能根本解决争端。例如：

就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毛泽东关于“伍豪事件”的指示并未落实。王洪文甚至

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来，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见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铁骥《最后的斗争》，均载于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66、353页。）

就在周恩来一口气解放175位将军（谢国民《175位将军的解放》，同上书，307—320页）的同时，毛泽东发动了指向“兴灭国，继绝世”、“克己复礼”的“批林批孔”运动。但当“四人帮”联系实际批“走后门”时，毛泽东又说“走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不要“形而上学猖獗”。

基辛格访华期间，周恩来因私自会见基辛格，洽谈军事合作的问题，毛泽东亲自掀起了一场大批“右倾投降主义”的风浪。在之后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到要“准备打仗”时，甚至含沙射影地暗喻周恩来“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但当江青、姚文元把问题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控周恩来“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时，毛泽东又指责江青，“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471页）

当“四人帮”仿照延安整风的调子，借批“经验主义”责难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时，毛泽东又说“教条主义仍是主要危险”。并说江青，“我看她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不仅如此，在1974至1975年间，毛泽东还多次批评江青“有野心”，批评他们“搞分裂”、“搞四人帮”小宗派；说“总理还是总理”，赞赏邓小平的“钢铁公司”（意指邓小平有原则，不向江青的“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屈服）；甚至明示王洪文不要翻来覆去，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但是，这并没能制止“四人帮”的聚集，和政治上的一意孤行。

1975年5月，毛主席甚至几次提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以上毛的谈话，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395页）

——毛泽东此番的讲话，并没有收到上一次“逼”走林彪的效果。究其原因，大概不是“四人帮”乃一干“无用文人”，没有“天马行空”的资本和逃路，实因毛、林当日的“君臣关系”到这个时代已不复存在。对此，毛泽东是心知肚明的。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到了《红楼梦》的“贾母之死”，他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段描写。（徐中远《毛泽东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13页）

毛泽东还说江青：“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不在她眼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395页）

关于毛泽东与江青和四人帮的“新关系”，徐景贤还有一个生动的细节记载：

“在铅印（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引者注）印发时，江青要求把原信开头的称呼‘江青’改成‘江青同志’，经请示毛泽东，没有同意，只是在作为中央文件印发时加了个标题：‘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一封原件已烧毁的毛泽东信件》）

——此时，在江青眼里，毛泽东已不仅是一个“土包子”，而且是一个集顽固、老迈、衰朽和说谎于一身的“可厌”的人了。就连一个小小的王洪文，也把毛泽东的劝诫当成耳旁风。对

于他的这帮“好学生”来说，他存在的唯一意义，只剩下帮助他们在未来政治权力的格局中多挣得一些“份额”了。

毛泽东的晚景，怎一个“悲凉”了得？！

#### ◇ 得不偿失的周恩来

“新三国演义”的格局已成，但毛周交易仍然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周恩来“甘愿入伙”，究竟得到了什么？所谓“投降问题”到底能否立案？它到底是毛泽东的“松绑”，还是出于疑虑、报复而为周恩来套上了一个牵制的“笼头”？其疑问，因下面几个问题的存在，而凸显出来：

其一，周恩来的问题早有“历史定论”。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历来以善打政治“太极拳”著称的周恩来，这一次却显得不那么潇洒，也不那么“超脱”。他有什么必要真的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去作一次说明？这看上去犹如有人说他“有尾巴”，他就急忙“脱裤子”一样，先在尊严上就输了一筹。

其二，如果“伍豪启事”本是“空穴来风”的话，在这场重大交易中，毛泽东不是太“占便宜”了吗？

其三，最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自己，居然为这件本来“不存在”的问题十分“挂心”。铁骥在《最后的斗争》一文中，记述了周恩来罹患癌症晚期，不得不再次动手术时，在手术室门前发生的既令人心酸、又令人难以理解的一幕：

（1975年）9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最近评《水浒》、批“投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20日下午2时，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52—353页。）

——连骨灰都不打算保留的周恩来，有什么东西如此“放不下”？

2003年10月18日于北京

~~~~~  
【史实辨析】

吴法宪为什么闹翻案



庐山会议后，因与陈伯达有牵连，吴法宪急得要自杀。他的妻子陈绥圻阻拦说，你不能死，你一死，什么事都推到你头上了。吴是个老粗，他的老婆应该相差不多。但陈的这些话，倒是说出了政治高层斗争的一种规律，即一切事情都可以简单地推到一个无法为自己辩解的人身上。现在我们动不动就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如何如何。其实很多事情与林彪无关，这种说法不知是说顺了嘴，还是有意要为江青一派开脱？现在知道，六十一人叛徒案与二月逆流案，林彪都没有插手。而那个臭名昭著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与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经常被用来作为林、江勾结的证据，其实也不是林找江的，在这一事件中，林基本上是一件道具，被毛主席夫妻耍了。

有关林、江合流一事，有当事人刘志坚将军的文章在，刘在文章中的说法很意味深长：江青和林彪在座谈会和纪要的炮制过程中，都施展了阴谋手段。首先，在军队中并无职务的江青到军队去开座谈会，搞纪要，是完全背着党中央，由江青、林彪两人策划的。会议也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其次，制造了一些假象。比如，江青去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但在纪要中，又把江青召集座谈会，改为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召开座谈会。而林彪则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话，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3月22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摘自文汇出版社《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三辑·神圣与荒诞·1966—1976，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菜九按，聪明的林彪，在这里已通过有形的文字记载向历史递话，所谓他与江青勾结云云，不过是表象，他又如何能抗拒上面的压力呢？这个材料是可信的，因为刘志坚是文革的受害者，对林彪并无好感，没有理由为林彪开脱。

在这里，林彪已经为自己留后路了，现在各种材料都说“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是毛主席加上去的。林在这种情况下，以这样的方式向历史递话，确实如刘志坚所说，是“是煞费苦心的”。

关于二月逆流，那场大闹，不仅林彪不在场，连一贯喜欢出头露面的叶群也不在场。而毛主席为此而发的“无产阶级之怒”（康生语），发动批判二月逆流的会，林彪也没参加，只是让叶群参加了。在这种毛主席亟需林彪支持的时候，一贯紧跟的林彪的这种表现，不能不说是一种表态，一种对毛主席不利的表态，而从历史高度对自己有利的表态。如果不把林彪与江青联系在一起，人们对这个人甚至都恨不起来。因为他头太滑了，凡是罪大恶极之事，都尽量撇清。难怪他日后要倒台。

说林彪对老干部有仇恨可能也没大错，但他对老干部的不满，不会大过他对中央文革的不满。不管怎么说，那些人都没有战功，林彪是羞于与他们为伍的。他这是学了韩信，韩信羞与樊哙为伍。而四人帮显然连樊哙也比不了，他们什么都不会，就会仗势欺人。而以林之孤傲，还要看江青的脸色，这口气，他又怎么能忍得下来。正因为如此，林彪基本上没有与中央文革在一起开过会。这是自重身份的表现，也是保持距离的表现。所以林彪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表态，基本上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落井下石，而不是挑起事端，为了保住已到手的地位，不得已做一回打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林彪出事后，毛主席指著叶剑英对一些人讲，你们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的了，那是反对林彪、

王关威的。而二月逆流并没有反林彪的内容。毛主席为此定了调后，林彪就与二月逆流挂上钩了。大家都跟着这样说，如：1972年12月间，毛泽东又问及谭震林的近况。周恩来立即写信给当时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谭震林不久回到北京。（文汇出版社《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三辑·神圣与荒诞·1966—1976，曾涛《正义的抗争》）但这样的说法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菜九按，吴法宪老婆说，你一死，就什么都推到你头上。周总理对林彪在怀仁堂会议一事的说法，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林彪当时什么事也没干。

吴法宪现在闹翻案，用的也是死无对证的手段。把什么事都推到毛主席周总理身上。可惜解释权不在他手里，而他的事又无关大局，是他个人的事。他一定是把毛主席周总理交办的事情与他自作主张的事混在一起，把水搅混，谁能说出是真是假。他原先的交待都在审判中推翻了的，还有什么推不倒。他这一闹，还真的不能与他认真。李雪峰不是平反了吗，吴法宪也要平等对待。这或者就是他的逻辑。

胜者王侯败者寇，你不仅败了，而且死了。剩下来的事，还不是想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胜利者和失败者共同创造历史，而只能由胜利者来诠释历史。这就是现实。林彪不服气也没用。谁让你不仅败了而且死了呢？这个吴法宪也是个失败者，但还没死，所以还有讲话的余地。只是他的话能有多大收效，也只有天知道。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

#### 【学术批评】

#### 重要史料缺出处和情绪偏见影响权威性 ——点评《晚年周恩来》

• 洪 辉 •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三版），已经引起高度关注。其主要价值在于系统引用了尚未解密的中共文革档案，记录了与文革相关人士的采访（包括纪登奎、吴法宪、乔冠华和章含之等），并系统记录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历史恩怨。但是，如果从该书能否存世和传世的高度，或者从作者自许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标准来衡量（页609），笔者觉得尚有相当距离，值得评点。

#### 一、重要史料缺乏出处

《周》得出的一些关键结论，缺乏翔实的史料予以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的史料权威性和可靠性。

例一，有关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周的追悼会，作者引用了汪东兴私藏的与毛的谈话记录，并由此断定毛是故意拒不参加周的追悼会。据作者称，毛在周去世后的第五天（1976年1月12日）与汪东兴说道：“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页604）如此重要的证言，竟然不提出处！而作者只是提到张玉凤对此事的个人解释，即当时毛的腿确实“走不动了”（页602）。除此之外，通篇都是作者的主观推断和议论，缺乏第一手档案材料予以印证。

例二，作者不惜引用野史流传而没有正史依据的“故事”，来证明毛对周的仇恨。作者提到，当周去世后的除夕之夜，毛的住处大放鞭炮，而且第二天从毛住处“拉走了整整一卡车的鞭炮屑”（页7）。作者不仅没有解释鞭炮为什么不是在周去世当天燃放，而是在一个月左右以后的除夕之夜燃放？而且也没有解释这一鞭炮燃放与毛的恨周情结，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对待如此重要的燃放鞭炮一事，没有注明目击者的出处和任何可信的原始资料。（尽管据笔者所知，张玉凤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过这一故事，但张所解释的放鞭炮之原因与《周》所提到的原因，完全不同）。

例三，对一些当事人的采访，作者忽略了他们本身的政治偏见与立场，往往照单全收，缺乏其它的史料予以佐证。例如，有关邓小平在1973年底，对周恩来的“诛心之论”这一重大的历史新发现，作者所使用的原始资料仅仅是对纪登奎的面谈。如邓为了在毛面前考试及格，在政治局批周会上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确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页472）。众所周知，纪登奎对邓小平的成见颇深，他是被邓小平当作四人帮的同党而被整肃，所以他在1988年所接受采访难免有失偏颇。

例四，对周和江青在处理王光美的态度上，作者只是凭籍江青的政敌吴法宪的面谈，就断定是江青主张对王光美实行严惩。但根据原始档案记载，是以周为首的专案组，建议对王光美“依法惩办”，而且周还专门批示：“应予判刑”。相反是毛刀下留情，提出：“暂时还不宜判刑”（页254）。对此，作者似有贬抑江青、讳过周恩来之嫌。其实，作为负责任的史学家，必须再找另一个有力的原始资料予以佐证，才能采信有特定立场的当事人的口述。这是口述史的基本学术要求。

例五，作者大量使用“据知情人说”这种不负责任的“出处”（页354、页550、页576、页604等），推出许多具震撼性的、但鲜为常人所知的关键史料，并仅仅凭“知情人”所知，就作出相关的历史结论。例如，针对林彪逃亡苏联一事，作者提到林彪所乘专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在飞机上曾进行过抵抗，而且提到潘身上有枪伤等重要信息，但作者的根据只是“一位知情人”和“据说”（页354），影响了《周》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另外，在周死后，毛曾说：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页604）。这一反映毛周关系的重大史料，其根据又是一个“据知情人说”！

此外，张春桥在文革后被关押期间，所提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精辟之论”，原本十分具有史料意义，但却也只是作者道听“知情人”之说。张说：“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与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页550）。有意思的是，如今的一些新左派与张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只有再来一场文革，才能彻底制止目前中共的糜烂性腐败。

其实作者多次使用的“据知情人说”，很可能误导读者，因为作者的身份是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人员，并曾在那里的档案室“泡过十几年”（页9），很可能使读者以为，作者的语焉不详，必有难言之隐，而不可能是口说无凭，所以容易使人认定，所有的“知情人”都是极具权威的原始资料，但事实有可能并不尽然。由此表明，作者写史功底的欠缺，至少是治史的态度不够科学与严谨。

## 二、情绪偏见处处，曲笔讳过多多

作者多次表示，《周》是“力求立论公道，既不讳过，也不苛责”（页609，页10）。但

作者不仅对周的行为讳过，而且对与周相关的人物，尤其对毛泽东则不免有情绪性地苛责，偏见明显。应该说，史书能否存世的一大标志是观点平实、价值中立（value-free），切忌刻意地褒此贬彼，求一时之快。很显然，所有读过《周》的读者，都不难感受到作者对毛泽东的淋漓尽致地鞭笞，而且运用了许多不必要的非理性的贬义词，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周》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作为“春秋笔法”的一个基本要求，史家必须十分慎用评价历史人物的情绪性词语。

例一，同样在描述毛和周去世的事实时，作者对毛的描写是“一命呜呼”（页606），而对周则是“离开了人世”（页601）。对此，笔者一方面理解作者的出身背景和成长过程所决定的恨毛情结，但另一方面，在如此强烈情绪下所写的史书的客观性，就不得不使人有所质疑。

例二，同样是描述残酷地整人，作者对毛的评价是“阴毒老辣”（页253）、“气势汹汹”（页126）、以及“精于权谋”（页275），而且毛整人的手段往往是“劈头盖脸”（页125）、“铤而走险”（页179）和“杀人不见血”（页378），加上毛“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页204）、“惯于逢场作戏”（页206）、“故意放风，迷人眼目”（页519）、“正话反说、假戏真做”（页524），常常撒“弥天大谎”（页290），是“真正的祸首”（页580）。作者对毛性格的评价则是“生性猜忌多疑”（页274）、患有“被迫害妄想症”（页306），常常“恼羞成怒”（页289）、“过河拆桥”（页275），并且“奢权如命”（页370），是一个“枭雄一世”的人物（页88）。其实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完全没有必要如此频繁地使用激情之语，因为这毕竟不是一部章回小说，它需要的是历史理性，而不是文学激情与商业卖点。

例三，作为对比，作者对周的各种缺德的整人行为，则多有善意和褒义的曲笔。如周的整人动机则是为了“保持晚节”（页101）、“身不由己”（页102）、“顾全大局”（页249）、“以退让求生存”（页177），而且认为周整人的手段也是“苦口婆心”（页139）、“煞费苦心”（页183），周整人时的心情则是“有苦难言”（页360）、“忧心忡忡”（页136）。尤其是周在整人的过程中，作者认为周遵守的是“顺守之道”（页115）、“执二用中”（页134）、“尽忠守份”（页473）、以及“太极软功”等（页487）。并且，周往往是“有志难伸”（页359）、“无端蒙冤受辱”（页477）、“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页127），“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页179），旨在“匡济时艰”（页214）、“苦撑待变”（页225），而不提周的折衷之道也是一种损人利己的一种权谋。虽然作者提到，他在接触一部份文革专案审查材料上，发现周有大段批语，其“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页184），但作者一不将这类批示直接在书中公布（除批刘少奇外），二不对周如此主动而又积极的严厉批文，使用作者乐于使用的形容词，将周斥之为“老奸巨猾”、“两面三刀”。其实，如果周真是处于被逼无奈，完全没有必要写上“大段的”、“严厉的”、“绍兴师爷”式的整人之语。

例四，有关毛阻止周及时治病的重大情节，作者只是交代了一些事实，但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毛故意害周的有力证据，仅仅依据毛通过汪东兴所传达的四条指示，就草率断定这是“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将周推上死路”（页379）。例如毛提到，第一对周的早期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其实这是中国社会文化所遵循的惯例和常情，无可厚非。第二，毛指示“不要检查”，这也有可能是顾虑检查的后果会加速病变；第三，“不要开刀”，这是当时对中共主要领导人大都采取的保守疗法之一；第四是“加强护理和营养”，这显然应视为毛的一种善意（页378）。其实，最后周在1975年3月的癌症切除手术，也是经毛批准的（页547），如果毛存心害周，为何要此一时、彼一时呢？作者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解释。

众所周知，中共历来将领导人的治病政治化，可谓一种“中共治病文化”。在此文化下，官

员可以为了躲避政治麻烦，无病装病；也可以为了政治权力，有病变无病（如文革中的林彪）；而治病不由病人本人作主，“医疗为政治服务”，更是中共一贯的党内保健制度所规定（页 5 1 4—5 1 5）。毛阻止周及时治疗膀胱癌，应该属于这种中共治病文化的表现，而很难定论为毛故意借此将周推上死路。当初周的盟友叶剑英也是为了政治需要，强制要求周的医疗小组暂不对周开刀，实行保守疗法（页 5 1 4），因为叶等元老急于促成周，完成飞长沙见毛的重大任务。作者对此采用了双重标准评价此事，认为毛对周的病主张保守疗法，是为了政治需要而故意陷害，而叶对周的病为了另一种政治需要而实行拖延，则是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页 5 3 9）。

### 三、评价体系的双重性和矛盾性

作者在评价周和毛功过的过程中，存在根本性的自相矛盾和双重标准。一方面，作者将毛和周的行为是放在“皇权专制主义”（页 8 4，页 6 0 9）的框架下进行批判的，所以作者对中共党史的理解与认识，基本上是运用宫廷权力斗争的脉络来安排，毛周的关系也是按照封建的君臣关系作为核心思路来展开。但另一方面，作者并没有按照皇权专制下的皇帝和丞相的标准，来评价毛周，而是下意识地将毛视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将周视为“人民的好总理”。这样，毛在文革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十恶不赦，周当然也不够伟人的标准。

对此，作者首先需要厘清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问题，需要在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体制之间，建立一套协调、对应和统一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认定中共在文革的体制就是封建的皇权专制，中共的革命是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的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那么毛就是一个开国皇帝，周则是开国宰相。于是，史学家对毛也只能用普通皇帝的标准予以审视，同样，也只能使用宰相的为人为政的标准，客观评价周。

如果是这样，那么史家就需要对明君和昏君建立一个统一、规范和客观的评判标准，其重点应包括检视皇帝们在位期间，出现的是国家统一还是疆土分裂、经济升平还是民生凋敝、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割据、勤政爱民还是荒淫无度、纳谏成风还是以言治罪等；对宰相也需要一个基本的、普遍适用的标准，如是忠君爱国还是欺君罔上、秉公直谏还是逢君之恶等。

因此，对毛的评价就需要引入各主要朝代著名皇帝，作为比较的参照系，包括秦始皇、汉高祖、成吉思汗、唐太宗、宋太祖、乾隆和康熙等，同样，也需要将周与张良、萧何、魏征、秦桧和李林甫等名相、奸臣等一并比较。进一步而言，有关毛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就需要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毛对党内同仁的整肃，也应该与刘邦对待当年开国功臣的手法，予以比较。

如果作者将中共体制视为共产专制主义的话，那么，作者需要将同时代各共产国家的领袖作为参照，如斯大林、波尔布特、金日成、铁托、霍查和胡志明等，与毛进行比较，并建立一套基本的标准。例如，在对待党内异己的手段上，斯大林习惯用枪决的方法，对异己实行斩草除根，如布哈林；而毛对政敌的手法是“杀人不见血”，允许他们“吃饭、拉屎、睡觉”，对十恶不赦的刘少奇，也是要求在“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页 2 5 2）。对此，史家切忌用民主国家华盛顿或林肯的为人为政的标准，要求毛和斯大林等做到理性问政、民主决策。

同样，如果作者认为中共体制是皇权专制主义与共产专制主义的杂交，那么，作者就需要将上述的封建皇帝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进行综合和交叉比较。历史人物必须也只能被放在特定的政经体制下予以评价，毕竟，存在决定言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讳过”、“不苛责”。

除了评毛论周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存在矛盾外，作者对周的批判底线一般仅止于周的性格悲剧、愚忠心态和晚节情节，而忽略了周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所表现的政治野心、狭私心理、损人利己、以及害人不利己的种种行为。作者多次强调，周的许多过失与周的隐忍、屈从和自保有关（页45），但并没有深究为什么周的本能是自保？自保的目的有没有害人的成份？与国内流行的将周的过错一概推给“四人帮”和林彪类似，作者的基本思路是把周的主要过错，归因于毛的逼迫，而没有深入理清周在文革中的种种行为，哪些是为毛所逼，哪些又是周主动而又积极的“创造发明”。这是作者和其他史家今后需要努力深化澄清的难题。

另外，作者只是强调了周秉承儒家“温良恭俭让”的品格和愚忠的君臣之道，但忽略了儒家另一更高层次的品德——“以死进谏”、“士可杀不可辱”。其实，周对毛的种种劣行不仅不予阻止，而且推波助澜，更深层的原因应该需要从周的私德领域中去寻找，对此作者显然缺乏深入分析。人们有理由设想，如果毛在1972年去世，周成为中共第一把手，周是否会沿用中共几十年来惯用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付同党异己？人们从周对顾顺章一家无辜的老少实施无情的残杀、对铁血无情的中共特务系统的长期掌控、以及对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贺龙的落井下石，应该能够找到一些启示性的答案。毕竟，周是文革中所有重大专案组的组长，一切重大专案的定论，都必须由周签字。对此，笔者以为，分析一个历史人物的品德，关键不是看他如何对待朋友，而是如何对待他的敌人，尤其不是看他所信奉的主义和内容，而是看他为了主义所实施的手段。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尽管使用了大量的不必要激愤之词谴责四人帮，但也用了一些难得的“直笔”。如作者认为，在毛死后，虽然文革派纷纷反戈一击，包括王洪文和姚文元，但只有张春桥和江青“拒不认错，没有背叛毛”（页550），这表现了江和张的一个基本人格：即坚持理想、决不背叛。仅就这一点，张、江的人格就比见风使舵、揭发朋友以自保的周恩来等，要高出一筹。当人们在赞赏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决不低头的人格之时，以为赵是中共党史上决不认错的第一人，其实在赵之前，已有了张和江。

总之，《周》开了一个重评毛周、反思文革的良好开端。笔者希望高文谦先生能够成功地“向民间独立学者的角色转变”（页609），真正做到“不讳过、不苛责”，为传世之作的早日成功而不断努力。

□ 于2003年6月9日

~~~~~

## 【亡灵祭坛】

###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名录

• 曹思源 •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日益“成熟”，专政的法宝就大显神通，在全国上下愈演愈烈，几乎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拖下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部份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情况，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有所认识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底，全国平反了涉及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给四十七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公民得以脱离“专政”的

苦海。

——为邓小平、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为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为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肖劲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人平反；为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人平反；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冤案刘少奇案平反，仅此一案就直接株连了一万多名干部群众。

——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周小舟、张琴秋、邓拓、廖沫沙、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章汉夫、赖若愚、董昕、冯雪峰、马明芳、王维舟、贾拓夫、张子意、陈昌浩、杨献珍等人平反。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宣布对文革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电台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所有人，全部平反，而总人数已经无法准确统计了。

——对省部级干部复查审理平反。文革前的全国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一千二百五十三人中，在文革中有百分之八十一即一千零一十一人受到冲击，遭到迫害。

——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云南沙甸事件、内蒙古新内人党、北京“三家村”、“二月逆流”等冤案平反。

——改判、平反冤杀错杀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通过正式司法程序共判处死刑两万三千九百二十一人，其中“反革命罪”就有一万零四百零二人，全是冤杀案错杀案，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等人即是典型事例。

——为中央和国务院的受冤部门平反，如撤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摘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阎王殿”帽子；摘掉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的“投降主义路线”帽子；为被毛泽东斥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国家文化部、诬为“阎王殿”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平反。

——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如翦伯赞、高崇民、吴?、马寅初、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黄绍雄、吴晗等人举行追悼会。

——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平反。

——为文革前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如一九五九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党员；一九五五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受株连的两千多人；一九五八年青海省平叛斗争扩大化而株连的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被错误处理的所有人；“华北山头主义”错案；共产党的专政机关——政法系统的高级干部潘汉年、杨帆等人的冤案等等。

——为五十四万多“右派分子”平反，给失去公职的二十七万人恢复公职或安置生活；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近三十二万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改正并落实政策；为“四清”“整风、整社”“三反五反”等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

——清理和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给所谓“地富反坏”分子一律摘帽；取消所谓地主、富农的成份划分，从而使全国至少二千万“二等公民”结束了三十多年来倍受歧视和打压

的历史，终于享有应有的公民权利。

——恢复全国七十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从业者的劳动者成份。

——纠正“农业学大寨”所在地昔阳县的冤假错案三千零二十八件，为两千零六十一人恢复名誉。

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无产阶级专政鼎盛时期的文革中，有多少社会名流、文化名人从身体到灵魂被专政的“铁拳头”打得死去活来，没有了尊严，没有了人格，迫不得已地选择了自杀的道路。究竟有多少人由此而告别了宝贵的生命，可能永远都是个谜，以下只是他们中的一小部份：

——邓拓，生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等职；一九六六年五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五月十八日自缢身亡，是那个非常岁月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田家英，生于一九二二年，一九四八年八月起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被停职反省，并要求立即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二十三日突然死亡，怀疑自杀，死因诸说不一。

——李平心，生于一九〇七年，历史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建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自杀。

——老舍，生于一八九九年，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因不堪忍受迫害投太平湖自尽。

——陈笑雨，生于一九一七年，著名文艺评论家，历任文艺报社副主编、新观察杂志主编、人民日报社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等职；文革初期即遭批斗，不甘屈辱，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生于一九一一年，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杂志副总编等职，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自缢身亡。

——叶以群，生于一九一一年，著名文艺理论家，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等职，一九六六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生于一八九六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一九二五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黄侃、梁君超，从一九四九年即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一九六六年自杀身亡。

——阎红彦，生于一九〇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等职；因对“中央文革小组”所作所为强烈不满，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凌晨吞服安眠药自杀，并留下遗言：“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



——李立三，生于一八九九年，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曾领导过安源工人运动和五卅运动；一九六七年，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十四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后，六月二十二日晚服安眠药自杀，留下一封《致主席》的遗书。

——陈璉，生于一九一九年，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之女，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就诬陷她是叛徒、特务，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从十一层跳楼自杀。

——胡慧深，生于一九一一年，著名表演艺术家；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生于一九二四年，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曾任共青团重庆市委的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惨遭迫害，一九六七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生于一九三一年，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诬陷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夜自杀身亡。因怀疑她腹中藏有用于特务活动的微型收发报机，死后还被剖尸检查。

——容国团，生于一九三七年，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一九五七年自香港回大陆，曾多次荣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目睹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杨朔，生于一九一三年，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成员等职；文革中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生于一九〇九年，政治学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五七年在“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打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受尽打骂侮辱，一九六八年八月投河自尽。

——傅雷，生于一九〇八年，著名翻译家，著作等身；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九月二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九月三日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生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历史学家，出版有《中国史纲》等十八部专著，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对前途绝望，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偕妻戴淑宛一同自杀。

——李广田，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作家，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市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残酷迫害，一九六八年跳滇池自杀。

——吴晗，生于一九〇九年，历史学家，二十八岁时就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一九五九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遭到批判，文革中受尽残酷迫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自杀身亡。

——顾而已，生于一九一五年，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因三十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其历史而备遭迫害，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八日，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的门梁上自缢身亡。

——范长江，生于一九〇九年，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一九四九年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一九四九年后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跳井自杀。

——闻捷，生于一九二三年，著名作家、诗人，曾任新华通讯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后又被张春桥点名批判，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三日张春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闻捷当晚写好遗书，开煤气自杀。

——王重民，生于一九〇三年，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一九四八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一九五二年起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五日自缢身亡。

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部份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还有：

文学评论家陶然，一九六六年；  
小说家孔厥，一九六六年；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一九六七年；  
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贾拓夫，一九六七年；  
中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任南汉宸，一九六七年；  
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一九六七年；  
古典文学专家李嘉言，一九六七年；  
著名作家田汉，一九六八年；  
教育部副部长柳是，一九六八年；  
佛学家喜饶嘉措，一九六八年；  
文学评论家胡先肃，一九六八年；  
小说家彭柏山，一九六八年；

□ 节选自曹思源著《修改宪法》第二节“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威胁面百分之九十九”

~~~~~

## 【以史为鉴】

谁识老毛真面目？——读《王申酉文集》

• 余 杰 •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郊区的刑场上。一名年轻的文弱的书生被执行了枪决。

他因思想而被杀害。他的悲惨命运与三十多年前在延安被杀害的王实味一样。他以他的死亡证实了一个政权的独裁、残酷和无耻，他以他的生命捍卫了人类亘古以来就信奉的一条真理——“不自由，毋宁死！”

他就是王申酉，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对毛泽东的邪恶本性有深刻认识的少数先知先觉者之一。他被我们遗忘了二十多年，跟顾准一样，他也

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语）。如今，王申酉的文集终于整理出版了——遗憾的是，这本文集依然只能在作为“海外”的香港出版，大部份大陆读者依然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位先知灼热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见本刊物 z k 0 2 1 0 a、b——编者）

在这本文集中，收录了一些王申酉论文、交待材料和日记等文字。其中，他的日记是我最感兴趣的部份，他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真的做到了“我笔写我心”。在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知识分子普遍处于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心态的背景下，王申酉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一样勇敢地说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话。如果说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是出于天真和本能，那么王申酉对毛泽东缔造的极权主义体制进行质疑和批判则是出于一种思想的自觉。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 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依我看，只有回复到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大批的人们去做最简单而繁重、单调、效率极低的劳动，才是最符合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政策决定了将走向这个极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放在今天的背景下，这些观点似乎“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那个全民族集体被催眠、集体陷入疯狂的年代里，能够一眼看穿毛泽东的专制本性和阴险伎俩的人确实寥寥无几。在日记以及后来的“交待材料”中，王申酉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否定反右和文革这些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停止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些思想后来部份地成为邓小平的施政思路，但直到今天他所涉及的某些方面还是言论禁区。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王申酉生前所希望的“自由中国”依然没能成为现实，这更说明其思想的“先锋”价值。尤其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体系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中国现实社会中一个绕不开的、官方也不敢触动的问题。

在新左派高举毛泽东画像作为反对全球化的旗帜的今天，重温王申酉的文字更加重要且必要。昨天，王申酉因为批毛而被杀害；今天，新左派却因为拥毛而获得国内外的各种资源。其间，历史的吊诡让人深思。愚昧往往与喧嚣联系在一起，而智慧从来被迫保持沉默。这也正是毛泽东至今依然呆在神坛上的原因，正如学者陈奎德所言：“现在是对毛泽东进行历史性清算的时候了。否则，在当代，由于官僚集团整体性的腐败，由于贫富差距惊人的悬殊，由于中国弱势群体的空前无助，由于被迫害者被冤屈者无法讨回公正，由于生存现状的急剧恶化，由于人类的健忘本能，同时也由于审美的距离感所产生的浪漫效果，如同屡次的出现过的人类的集体性遗忘和集体性心理回潮一样，势将导致的对历史的诗化。中国大陆时起时伏地出现的‘怀毛热’就是明证。它把那血腥时代供奉上神坛，中国人的血泪成为装饰历史性浪漫画卷的色彩，使左翼极权势力卷土重来，强烈干扰中国进入文明世界的进程。简言之，没有对毛时代的批判性补课，中国的一切实质性进展都无从谈起。”

在阅读王申酉的文字时，我不禁想起了那些识破毛泽东丑恶面目的思想先驱们，他们当中，既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大师胡适，也有从中共阵营中反戈一击的启蒙领袖陈独秀；既有作为北大学子和基督徒的林昭，也有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老革命”李锐。我还想起了关于傅斯年与毛泽东之间的一段故事：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一

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歿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黄炎培病逝于文革前，不能说“不得好死”。—编者）

王申酉不是毛直接下令处死的，但毛无疑是杀害王申酉的元凶。王申酉之死是毛仇恨知识分子的又一例证。余英时曾经分析说，毛相信自己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合而为一，是后者的最新化身，因此他自己即是上帝。在现实世界中，他则与人民群众合而为一。这两重的“合一”使他成了“信仰的卡里斯玛”。这种“信仰的卡里斯玛”最能感召虔诚的信徒，但是最终却最容易引起知识人或学者的怀疑。余英时认为：“毛一贯反知识分子，其根源即在此。因为智性的怀疑足以动摇他的卡里斯玛的信仰基础。”因此，像王申酉这样敢于怀疑毛的“伟大、光荣、正确”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被毛泽东的帝国所容纳的，他不得不死。

王申酉为了揭露毛的专制合独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期望未来的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大屠杀博物馆”，或者将今天的毛泽东纪念馆改造成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中，应当揭露毛泽东的暴行和罪恶，也应该纪念许许多多像王申酉这样被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所残害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像陈奎德所揭示的那样——“清算毛遗产也是极富现实感的国民课题。”、“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梏，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权的诸种借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地解脱出来。”我想，只有那一天到来了，王申酉、林昭、遇罗克们才能真正安息；只有那一天到来了，我们才能真正过上“摆脱恐惧”的自由生活。

□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七日、十八日

~~~~~

## 【读史随笔】

### 读《遇罗克》断想

• 郑也夫 •

《出身论》那年我十六岁。从此这个人与这篇文章永远存留在我心底。二十九年前我曾苦苦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杀死他？准确地说，一半是愤怒而缺席的质问；另一半则是真实的疑问，无法解开。他没有打砸抢，没有反江青和中央文革，没有在日记中攻击权势人物；就为了一篇文章、几个观点和他对出身与成份、社会影响与家庭影响的辨析？毛泽东曾对他的子女说，不要一上来就批判《红楼梦》，要先钻进去。我真的想读懂杀害遇罗克的真实思路，尽管我知道这思路上不了台面。我那时可以读懂《出身论》的全部字面含义，却没有读懂文字背后的社会历史。

重读遇罗克的文章，我懂了。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其数量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有海外关系者和历史反革命的子女，受歧视者接近

五分之一。每朝每代都有歧视和压迫。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压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使压迫明火直杖，十倍疯狂。遇罗克正是向着那神圣外衣——血统论的意识形态开战。血统论的意识形态是如此支离破碎。表现考察清楚了，可以完全不看出身；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但成份和出身完全是两回事，地富子女已是标准的普通农民——这些观点清澈见底，不容置疑。顺着这个观点走下去，将是对神圣的解构，对压迫的反抗。这十七年历史和五分之一人口，当家的最清楚，解构神圣意味着什么他更清楚。中国有句俗话：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由此便一切注定。于是这样的历史又继续了十一年。

遇罗克的思想、文风都超越了他的时代。为什么天降大任于这位25岁青年工人。少年的天份、敏感、受挫，尚不能解释一切。我们的饱学之士呢？我们的大学生呢？我们的思想者经反右运动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大学早已不是清静学堂，而成为高度政治化的领地。遇罗克科举落第，躲进对思想管束略松一筹的政治文化的边陲——农村，工余苦读真经，学有所成。没进大学未必是不幸，至少逃避了“政治催眠”。

出身的争论，三十年后，尘埃落定了吗？我觉得仍大可争论。如今流行的话是，苦难是财富。那么苦难更属于谁呢？它永远属于贱民，属于二等公民。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台词。曾文正家书为什么清末风靡一时，而今东山再起？因为富人的子弟成才太难。用理论家的话说：“历史是贵族的坟墓。”用民间的俗话说，风水轮不能光照一家。事实如此吗？为什么？我希望有人好好研究研究出身与成才的相关性。甚至斗胆倡议，再争论一番出身问题。别担心，历史不会重演的。消退了政治尘埃和话语霸权后，争论可望更深入些了

~~~~~

## 【各抒己见】

### 毛泽东与文化革命——中国精英集团和平民集团的冲突

#### • 危 言 •

毛泽东研究不需要神秘化，不需要在各种阴谋论中兜圈子。毛泽东的许多行为正如毛自己所说，是阳谋而不是阴谋。比如，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很简单，就是毛泽东明说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这些目标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而无法让人理解。在当时的气氛下，无人可以想像中国会变成资本主义。因此，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人们认为毛泽东是借革命的口号镇压自己的政治对手，是一场巨大的阴谋。这种看法，其实是把问题过份的复杂化了。

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在文化革命彻底失败几十年后这个问题就非常清楚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早晚会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这一点已经为邓小平的实践所证实。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邓小平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只能说，毛泽东有超人的远见，洞察事物发展的长远趋势。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是凡人，他无法扭转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

应该认真问一问的是，毛泽东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坚持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也很清楚了，没有社会主义，那么结果就是失业剧增，下层民众失去医疗保险，失去退休保险，失去免费教育，总之人民大众失去一整套社会保障和教育。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说他代表人民利益，尤其是代表普通工人农民的利益，恐怕他没有说错。

毛泽东代表平民集团，刘邓代表精英集团，文化大革命是平民路线和精英路线的一场大搏斗，或者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确实太残酷了，残酷的根源是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条都有致命的缺陷。按照平民路线发展，中国就始终处在大锅饭系统中，同时还不断地压制精英，因此社会生产力必然落后，落后就会崩溃。按照精英路线，就是今天的现实，一方面生产力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平民的社会保障系统全面崩溃。

毛泽东好比美国民主党，以民众福利为主要目标；刘邓集团好比美国共和党，以精英路线导向。可悲的是，毛刘两大集团之间的路线斗争并非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口水战，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差别较小，双方都以私有制为基础，两党的斗争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微调。然而，在公用制和私有制之间，很难找到中间道路。这是毛刘斗争残酷性的第一原因。

毛刘斗争残酷性的第二原因是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的固有缺陷，也就是把方法路线的争论变成正义与邪恶，朋友和敌人的较量。从而把两条路线的竞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相比之下，民主党共和党的争吵往往具有互相补充互相提高的作用。民共两党的吵架促进美国体制的完善，毛刘两派的斗争却把双方打得两败俱伤，社会退步。

毛刘斗争残酷性的第三原因是外部的。建国之后中国基本上处于被封锁的状态，时时要提防外国的侵略。在这种状况之下，必然造成经济发展不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这些问题会自然促发政治危机。这个结果本来就是封锁中国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

所以，中国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调和精英集团与平民集团的矛盾冲突，如何防止这种冲突激化。

从更远一点的历史角度看，国共两党的斗争也是精英集团和平民集团的斗争，国民党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英，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大众。

一般而言，精英集团的优势是掌握财富和知识，平民集团的优势是人多势众，因此这两个集团掌权的概率各占一半。萨达姆是伊拉克苏尼派精英集团掌权的例子，毛泽东则是中国平民集团掌权的例子。西方国家右派政党代表精英集团，左派政党代表平民集团，左右两派政党轮流执政，实际上是精英集团和平民集团轮流坐庄。

西方民主国家的多党轮替是消解两大集团矛盾的良好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始终没有成功地在中国实现。国共两党有过几次和平共存的机会，很可惜，这些机会最后都转变成战争。

一旦平民集团获得成功，那么平民集团的领袖人物就从平民转变成精英，形成一个新的精英集团。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它的官僚阶层自动地向精英集团方向转变。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阻止这种转变，就会出现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上层官僚集团转变成精英集团的代表。

毛泽东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他在成功掌权之后，面对诱惑，坚决拒绝向精英集团方向转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获得了普通民众长期的拥戴。

毛泽东的行动来自于他对历史的观察。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屡见不鲜，但是各个朝代又无一例外走向腐化衰败。平民集团可以战胜精英集团，它的领袖人物在胜利之后又自动转变成精英集团，因此平民集团的利益最终没有得到保障，而精英集团长期执政的结果会造成自我腐化，从而最终为平民集团所推翻，由此产生历史的往复。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决

定要改变这一自然循环过程。他的目标是让平民集团永久执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毛的方法是发动一次次的运动，在每次运动中都把精英集团打翻在地，不给他们以抬头的机会。

毛泽东的实践表明，平民集团要想通过这种方式长期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也是不可能的。平民集团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管理能力，而且做事粗鲁。因此在各次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种种严重侵犯人权的野蛮行为，经济发展也必然缓慢。所以，平民集团长期执政同样会走向衰败。

长期的精英执政和长期的平民执政都会走向失败，因此，中国应该认真考虑学习西方的方法，使平民集团和精英集团的代表人物轮流执政。这种想法也正是中国民主派历来主张的观点，但是笔者对这些“民主”派的观点始终抱有一份疑虑。

第一个疑虑是一部份“民主派”的代表性。从一些“民主派”的文章来看，他们已经成为外国势力的代表，或者是台独的代表。从某些外国的利益或者从台独的利益来看，中国最好是分裂和削弱。他们希望中国走前苏联的道路，分裂成几个国家，同时经济发展向后倒退。这些主张当然不符合生活在中国大陆人民的利益。最近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分析九一八事件中，为什么中国东北三十万大军面对几万日军，不做抵抗就撤退。分析结果表明，当时中国政府深受买办集团的影响，买办集团借助外国的力量发中国人的财，他们有钱之后可以随时逃离中国，因此他们并不为中国的根本利益着想。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吸取这一教训，不要让外国利益的代表人物来决定中国的政策。

第二，一些人以民主为口号，把自己说成是平民利益的代表，其实是在利用平民集团的短视，实现精英集团的利益。比如杨小凯主张把土地全面私有化，他声称农民会因此立即富裕起来。对这个问题，王力雄有过一个分析，他指出，私有化表面上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实质上是为了富人的利益。私有化之后，贫穷的农民很可能为了一时的眼前利益出卖自己的土地，造成土地向大地主手中集中。贫农在拥有土地时可能很穷，但是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一旦失去土地，他们只是暂时的富有，同时永久性地失去生活保障。如果中国突然实行西方民主，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王力雄所描述的“农民党”，这个党将主张土地私有化和停止计划生育，这两项主张可以从农民那里拿到大量选票，该党将因此而轻易上台。农民将从这两项主张中得到短期的利益，然而从长远看，农民将是这些政策的最大受害者。中国的发展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是不能对名人学者产生迷信。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在几个哈佛教授的指导之下进行的，结果俄罗斯只休克不苏醒。这些哈佛教授还不如没有学位的邓小平。

精英集团以短期利益为诱饵，侵犯平民集团的长久利益，这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潜在隐患。理论上，民主化可能消解精英集团和平民集团的冲突，但是精英集团可能利用民主化谋取自己的利益，剥夺平民集团的根本利益。如何在中国建立精英集团和平民集团的合理关系，依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 二零零三年九月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总编：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